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二七期 ——  
(二〇〇五年四月五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504b)

---

【千秋功罪】林案的玄机 and 蹊跷	史 学
【史海钩沉】1970年庐山会议开幕式	佚 名
【史实辨析】何以冠名“文化”的“革命”	李大苗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千秋功罪】

### 林案的玄机 and 蹊跷

• 史 学 •

#### ◇ 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

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那一段至今都“斩不断，理还乱”的历史。

无庸讳言，在文革中，乃至在几十年党内斗争的长河中，“谁没有整过人？谁没有被人整？”谁没有错误？谁没有功劳？

刘少奇整过张闻天，文革中被整惨死；彭德怀整过粟裕，文革中被整惨死；许世友延安时，被逼“兵变、叛逃未遂”，之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彭真在东北时挨过整，解放后，也整过人；罗瑞卿整过的人，也不在少数，文革中，他也被整得好苦、好苦……。不一而足。文革中，情况更复杂。对于刘、邓和那些先期就被打倒的同志来说，情况似乎比较简单：反对文革，一反到底。但细究起来，文革初期，谁没有“拥护”“执行”过极左的那一套呢？可是，对于文革中期和后期，被打倒的同志，情况就复杂得多：陶铸曾创造性地鼓吹过“怀疑一切”，结果还是死于非命。周总理在文革中也说了不少违心的话，也没有保下贺龙，这位应保、

可保而未保下的元帅。文革中，军队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毛泽东开始没有动军队。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军队的人，不能不抛出一些人，以求自保。文革中期，林彪自知不保后，奋起反抗，才有了林彪事件。冤冤相报，何时了？！其中的是非曲折、恩恩怨怨，谁又能说的明，谁又能道的白呢？！

二十多年前，陈云、胡耀邦、黄克诚对这一复杂的历史问题，有过一番高瞻远瞩、“老谋深算”的分析。他们指出：文革是一场“内乱”。是在我们党和党中央犯错误的复杂条件下，发生的。林彪和四人帮不一样，他们历史上有功。二十多年后，再解读他们的讲话，是否有“茅塞顿开”之感呢？讲话中的“内乱”，就是借用史称，太平天国的“杨、韦之乱”，自己人杀自己人。当年，刘、邓、陶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平心而论，林彪，黄、吴、李、邱，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都是为了共和国的建立，历经枪林弹雨，有过大功的人。文革的错误，是党中央犯错误，是毛泽东犯错误。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直接指挥”的一场“内乱”。党中央、毛主席应该对这场“内乱”负直接责任，负总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林彪和四人帮有过激烈的斗争。为什么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就是历史大功一件，而林彪与“四人帮”的斗争，就是“抢班夺权”，反党政变呢？历史不会认可这种荒唐的“双重标准”！林彪的历史功绩实在太大了。我们这些小字辈，是通过“三大战役”的影片，才解读到林彪辉煌的战史的。尽管影片中，把林彪描写成了“好人中的坏人”，但却掩盖不了林总为共和国的建立，呕心沥血的事实。把“战功显赫”的林彪和“身无寸功”的四人帮，硬绑在一起，有辱“正义的审判”！

庸庸讳言，没有陈云、胡耀邦、黄克诚同志，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超的政治智慧，博大的宽广胸怀和历史的长远眼光，是不能解读林彪事件的，也是不可能解开林彪事件，这一世界迷案、悬案的！更是不可能把我们党从“专案复专案，冤案复冤案”的政治“内乱”的漩涡中，解脱出来的！现在，我党从“内乱”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吗？原因就在于此。太平天国“内乱”的后果，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被清王朝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与其说是毁于“外因”，不如说是毁于“萧墙之内”！

#### ◇ 真相必大白天下

九届二中全会，还有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重大隐情：会前，毛泽东和林彪有过一次重要的密谈！

林彪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堕落为反革命政变的主谋，谋害毛主席的刽子手？刚刚在“九大”党章上被破天荒地定为“接班人”的林彪，为什么仅时隔1年，就要“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

从党内威望和资历来说，林彪远在毛泽东之下。刚被毛泽东钦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怎么敢在“个人崇拜”之风，达到登峰造极、甚嚣尘上的时刻，一反常态地“背”着“恩师”毛泽东，“私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说三道四，“公然”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这简直就是有悖常理的“蠢动”！

凡事都有源，有头。

有证据表明：就在九届二中全会，林彪讲话的前一天晚上，林彪曾前往毛泽东的住所，和毛进行一次密谈。当时只有叶群和汪东兴，守在门外。据说是为了防止江青闯入。这次林、毛在开会前的重要谈话，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情节，它是破解上述那些谜团的一个关键的切入点！

吴法宪出狱后，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从叶群处得知，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已首肯林彪的讲话。因此，他才在会上“紧跟”的。在林、毛这次谈话后，陈伯达为进一步证实叶群的话，凭着他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又向林彪当面直接求证了毛泽东已首肯林彪讲话的事实。之后，才有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种种表演。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近臣”，长期以来，最了解毛泽东的想法。正因此，在文革中，他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不幸的是，那天晚上，和叶群一直守候在门外的汪东兴，竟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也会“出人意料”地违背毛的“意图”，向“四人帮”大加攻伐，加入了“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行列，犯了文革中他唯一的一次“严重的路线错误”。吴法宪、陈伯达、汪东兴三个人，在会场上的全部表现，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林、毛在开会前的重要谈话中，确实包含了毛泽东事先已首肯林彪的讲话的重大隐情！

昨天还同意林彪的讲话，今天就翻脸不认帐。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恶劣政客品质，可见一斑！可以想见：一个中了“欲擒故纵”把戏的行伍出身的林彪，会作出什么反应。由此，再解读全会后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切，令人茅塞顿开！

破解这一重要隐情的关键人物，是汪东兴！他总有一天会说真话的！

#### ◇ 破解林彪事件的钥匙

林彪事件是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几十年来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理论界、新闻界、文学界的极大兴趣。这是因为，从目前官方公布的材料看，其中疑点太多，事实不清，证据太乱，逻辑牵强，结论武断！根本无法向历史交代，无法向世人交代。

究其原因，其一，“四人帮”的诬陷和编造，对搞清林案，打下一个很坏的基础。其二，由于派性的原因，由于难以压抑的狭隘的复仇心理，由于听不进陈云、胡耀邦、黄克诚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告诫，邓小平、彭真作出了“两案并一案”的荒唐的政治裁决，使得原本可以搞清的林案，更加扑朔迷离。现在，这些应该对林案起作用的政治人物，都已作古。他们没有尽到应尽的历史责任，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林案。也为国、内外好事者，提供了“想象”空间！

在林案专案审查的十多年，以及以后的二十多年中，最大的漏洞就是听不到“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客观地充分地”陈诉。事实上，几乎每一个当事人，都有在违反主观意愿的情况下，强迫按照专案人员的要求，书写“交待材料”的经历。因此，认真听取“直接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客观地充分地”的条件下的陈述，就是我们拨乱反正，查清林案事实真相的突破口。

现在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明里暗里，有意无意地在封堵这个突破口。使得不少“直接当事人”，至今心有余悸！在此，我们要提醒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两条：第一，必须明白：阻碍“当事人”，依法“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的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如果说，当年你们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认识不到“逼、供、信”的犯罪本质，还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今天，再这样搞见不得人的小动作，就必遭法律和历史的惩罚。第二，搞专案的人员，有一种侥幸心理：明知其中冤情重大，但“当事人”，大多年事已高，把林案捂到这些人统统作古，岂不是熬到“冤案变铁案”的那一天吗？请那些心怀侥幸的人明白：林案是举世瞩目的历史大案，全世界会放过你吗？历史会放过你吗？混是混不下去的！捂是捂不住的！熬也是熬不过去的！“往事并不如烟，历史岂能尘封”？！陈云同志为林彪事件考虑了两个星期，写下的那二百多个字，你们还记得吗？长期怀着“熬到那一天”的投机心理，你们不感到太累吗？

作为严肃的历史工作者，现在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大力抢救，发掘这些“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一切从可信的客观事实出发，这才是最终揭开林彪事件，这一世纪迷案的钥匙！

可以想见，当我们打开林案迷宫的大门时，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这些往日的“阶下囚”，怎么变成珍贵的“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

其实，您们也是重要的历史当事人！在如何编造“冤、假、错”案，这个领域，你们有着绝对的历史价值！你们把在这个领域，亲身经历的事实，向世人揭露出来，对我党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人民不再遭这份罪，就是历史大功一件！对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永远摆脱“专案=冤案”，“党派倾轧”，“政治清洗”“萧墙之祸”的内乱、恶梦和怪圈，真正走上民主与法制的光明大道，就是大功一件！何失落之有呢？

#### ◇ 四人帮在林彪案中造假

张玉凤、姚文元关于中央在林彪专案中造假事件的回忆，在范围上，有区别。张玉凤指出，那封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著名的，用来表明毛“早已看出林彪是野心家”的信，完全是在“康生的直接授意下，由张春桥起草的”造假产物！对此，毛泽东是完全心知肚明的！姚文元则提出了比张玉凤更为广泛的造假领域：“‘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

他们俩人，对当时中央造假的动机，提供了相同的证词：为了维护毛的“光辉形象”和权威，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公然通过了在林彪案中造假的决定！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合乎逻辑，可信。据姚文元说，中央还专门为此做了“决定”。历史正企盼着，这个“中央决定”，公布于世！

张玉凤、姚文元都是极其重要的直接当事人！他们的回忆，其份量之重，不言而喻！他们两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同一事件，发表内容相同的说法，其可信度，不言而喻！如属实，“四人帮”在林案中造假，已是“铁案”！

根据姚文元的说法：“‘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我们注意到，“掺了很多假”和“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的说法。据此，我们有理由提出那个至今找不到一个直接目击证人的被法庭“确认”为“武装政变的纲领”的“571工程纪要”，完全是张春桥、康生，“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不要忘记，当时，老奸巨猾的康生，在解读那“571工程纪要”时，故弄玄虚地说，“纪要”中，有些话很幼稚；有些话，不是20几岁的人，能讲出来的了。这正是他们造假时的阴险用心所在！

张玉凤、姚文元关于林彪专案的两段回忆文章，读来令人毛骨悚然。毛泽东伙同“四人帮”，在举世震惊的林彪大案上，导演如此“惊天骇俗的造假丑闻”，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杜撰如此“瞒天过海的欺世之作”，怎能不使世人瞠目结舌？！怎能不令世界舆论哗然？！这与当年希特勒法西斯在“国会纵火案”的所作所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此，当时的“中央文件”，绝不可信，已成不争的事实！当年举世瞩目的那场“正义的公审”，基本上，延用了“四人帮”时期的“中央文件”的指控，其可信度，还有多少？不言而喻！当然，历史还企盼着图们等人，这些“正义的审判”的重要当事人和“专案文学”的始作俑者，对专案和起诉过程的“实事求是”的回忆！据我们了解，已有几位专案当事人，在写这段历史。

届时，又要爆出“惊天丑闻”。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历史和人民有多伟大！不管你多会造假，政府机关内部的知情人们，一造反，一揭发，丑闻全暴露，“权威”全崩溃，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当也挡不住！

林彪事件的研究，大有搞头，大有文章啊！现在，我们不关心“翻案不翻案”的问题，只关心“事实和证据”！只关心历史当事人的陈述！

◇ 重提林案是质疑，是挑战，不是翻案

人们一提起林彪的案子，有人就会跳出来，说是“给林彪翻案”。问题绝不是那么简单！

人们重提林案，主要是因为林案疑点太多！事实与案情，还远远没有搞清楚！结论与判决，实在是经不起推敲，更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待！

事实是：重要的证据，都没有归案！关键的当事人，都没有得到自由陈述案情的权利！而且，有充分证据表明：毛泽东伙同“四人帮”，在林案中，确实公然制造了假证据，并为此，形成过准许造假的“中央决议”！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对林案的质疑，大多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林案盖棺论定，条件并不成熟！

林案的重要证据“黑匣子”，能要，而没有要回来；林彪带走的文件，能要，也没有要回来；至今找不到一个“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按现在的证据，似乎是“所有在林彪专机上死了的人，都知道那个“纪要”，而活着的，一个目击证人都没有；所谓的政变主犯“黄、吴、李、邱”，竟都不知“政变纲领”的“571工程纪要”；那个“三国四方”“指挥班子”，更是子虚乌有；所谓“林彪手令”，据说还有横排和竖排，两个不为世人知道的版本；“手令”是否出自林彪手笔，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九届二中全会”前一天晚上，毛与林的秘密谈话的内容，还没有披露；林彪坐机上的大洞，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坠机的真正原因，还众说纷纭，没有查清……总之，林案的玄机和蹊跷还多得很！

按正常刑事案件的办案程序，任何检察机关，面对有这么多疑点的案子，只会深入勘察，决不会贸然起诉！只有在当时法制不健全的中国，才会因为政治需要，迫不及待地搞出这种遗患无穷的“两案并一案”的司法闹剧！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疑点丛生的林案，提出质疑，对当时官方“结论”，提出挑战，是情有可原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现在重提林案，是要搞清事实，弄清真相，查清细节！对官方为一时政治需要，搞的那场“司法闹剧”，是质疑，是挑战，但绝不是翻案！

至于最后能不能颠覆当时官方对林案的结论和判决，完全要尊重历史事实真象！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如果林案真的是假案，颠覆了，岂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吗？！也符合我党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

我们不理解的是：有些人何看到人家一提林案，就神经过敏，就浑身不自在，就要骂街，就好像人家掘了他家祖坟？！如果他们是图们之流林彪专案的办案人员，倒也情有可原（事实上，不少专案人员也在反戈一击）。至于其他人等，就令人费解了。也许他们出于对林彪的“刻骨的阶级仇恨”。不过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关心的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刑事案件，如果参杂着半点个人的感情色彩，就会有悖于“公开、公正、公平”的基本司法原则了！

## ◇ 关于“571工程纪要”的重大疑点

“571工程纪要”，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纲领性文件。它的真实性，对整个案件的定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历经30多年的反复查证，这个所谓的“571工程纪要”，仍有重大疑点。

（1）至今没有查到关于林彪授意和批准这个“纪要”的直接证据。

“中央文件”中再三强调，“纪要”是林立果根据林彪授意搞的。但是，历经30年，始终没有查到林彪怎么授意，怎么审阅，怎么批准该“纪要”的证据。后来查获的“571工程纪要”，充其量，只是一个笔记，没有正式文本。也就是说，没有林彪对它的批语和认可的证据。为此，林案的专案人员，非常头痛。以致图门和高文明不得不推测说：有一个“正式文本”，被林彪一伙带上了飞机。遗憾的是，他们的推测，又与周恩来的话，发生了矛盾。周恩来说，林彪除了那本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外，什么文件，也没带走。因此，所谓“林彪授意”，只是一种猜测！

（2）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

根据现有的材料，不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集团“主犯”，没有看到过这个“政变纲领”，而且，在所谓政变“指挥班子”的所有成员中，也没有一个“目击证人”。就连参加过“南苑机场密谋”的成员和被“571工程纪要”列为“保密范围”之内的所有活着的“联合舰队”的成员，以及所谓“分舰队”的“上海小组”的成员，竟也都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个“571工程纪要”。也就是说，所有被关押审查的数万名涉案人员，没有一个人，看到过那个神秘的“571工程纪要”。

一位“权威”人士，在《谋害毛泽东的黑太子》一书中说：据那个在直升飞机上被俘的李伟信供认：在“571工程纪要”的制定过程中，他曾“断断续续”地在场外，作过一些服务工作，但没有直接参加“纪要”的制定，更没有亲眼目睹过这一重要文件。且不论李伟信，这样一个求生心切的阶下囚的话，是否可以采信。充其量也只能算“半个”孤证！仅凭这样“半个”孤证，怎能支撑得起“571工程纪要”，如此重大的历史情节呢？

因此，历经30多年的审查，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令人十分尴尬的、却又是不得不争的事实：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

世人不能不怀疑，究竟有没有那个“571工程纪要”？！是不是又象“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一样，是“四人帮”凭空杜撰出来的？！

（3）关于“571工程纪要”的出处，有着许多版本：57号中央文件中讲，是在空军学院的一个“秘密据点”的保险柜内查到的；后来作为“四人帮”时期，林彪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的纪登奎，又说是在被迫降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还有一个版本，说是一位空军学院的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事隔几天后，在清扫已是一片灰烬的“秘密据点”时，在桌子上的乱纸堆里，无意中发现的。而且是记录在一个被遗弃的小本子上。换句话说，还不是正式的文本。人们不禁要问：这么一个事关重大的机密文件，怎么会“无意之中”，遗落在一个已经被翻得狼狽不堪，已经被烧得遍地灰烬的垃圾堆里？让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员，将这么一个至今找不到“目击证人”的“绝密文件”，豁然之间，“大白于天下”？

根据一位对林彪一案颇有研究的“舒云”作者的最新版本说，就在林立果销毁了“秘密据点”的所有材料后，李伟信曾鬼使神差地到过“秘密据点”，并逗留了一段时间。这就为最后揭开“为什么林立果在‘秘密据点’，烧尽所有材料后，竟会留下最重要的‘571工程纪要’”之谜，打开了想象空间！

正是这些在时间、地点、目击证人等关键情节上，前后难以相互印证的“权威”证据，才使人们不能不疑窦丛生！

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内部，至今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的“571工程纪要”，被“正义的法庭”作为定案的最重要的证据。这种情况，在国、内外法律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 ◇ 质疑程洪珍日记本的出处

纵观林案的证据，有一个特点：关键的证据，不是出自当事人，而是出自一些“小人物”。如“571工程纪要”，就是只有李伟信的“半个孤证”。林彪是外逃的“主谋”，就是出自李文普的一句“孤证”。关于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和性质的证据，不是出自在上海与会的当事人，而是出自远在北京的没有参加会议的空军党办秘书程洪珍的“日记本”。

作为重要证据的程洪珍的“日记本”的出处的真实性，有重大不实之嫌！

1972年6月26日，中发72，24号文件，即所谓的“材料之三”P41中，指出：关于“三国四方”会议，“日记本”的影印件原文说：“会议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团结的气氛比较好，解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看法，认识。（1）主要矛盾在上海，在张、姚，统一了认识。（2）加速我们的准备。（3）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是上海——王，杭州——陈，南京——周，互相配合。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没授予指挥权。”同时，在该文件P41，有一个注解：“程洪珍的亲笔日记，是在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中缴获的。”

人们可能还记得，这个“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曾“出土”过著名的“571工程纪要”。而且是在一片狼藉的灰烬中，由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在桌子上找到了丝毫没有烧毁痕迹的“571工程纪要”。现在看来，林立果不仅没有烧掉“571工程纪要”，而且，留下了程洪珍的“日记本”，以备后查！这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

必须指出的是，关于“‘571工程纪要’是由王某某，在秘密据点的一片狼藉的灰烬中找到的”说法，是在世人对中央文件中“571工程纪要”是在秘密据点的保险柜中找到的说法，提出严重质疑的情况下，才“突然冒出来”，以正视听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程洪珍的日记本”，又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从“秘密据点”的灰烬中，“抢救”出来的呢？！总不会又是王某某偶然“发现”的吧？！

这些重要证据，在出处的时间、地点、过程上的矛盾百出，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是因为林案的调查过程时间太长，造假太多，而且参与造假的，又不是一批人。这样，在一些重要细节上，出现“疏漏”，以致首尾不能相顾，前后不能呼应，漏洞百出，也是在所难免的了！看来“说谎”也难。

#### ◇ 中央文件对陈励耘的两大不实之词

陈励耘，林彪疑案的重要人物。他是九届中央候补，原空五军政委。林彪案的法庭指控他

参与“三国四方”会议，被指定为“政变指挥班子”的“杭州的头”。

关于陈励耘的两大主要问题。

(1) 1972年1月10日中发72、4号文件(所谓的“材料之二”)第2页上说：“三月二十日，周宇驰到上海。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开会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个事与首长(指林彪)谈到，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林立果、于新野、李伟信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1971年3月22日至24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也就是说，陈励耘是“571工程纪要”重要的始作俑者之一。

(2) “材料之二”的第3页中，说到“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时，有一句非常重要，但却是闪烁其词的话：“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就是说，陈励耘是“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重要证人。

人们对此提出质疑：既然“571工程纪要”，是林立果根据与陈励耘谈话的“框框”写出来的，那么，陈一定知道“571工程纪要”的基本内容。为什么文件中不引用陈励耘的详细证词？！既然陈励耘交代“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文件就应该引用陈励耘关于会上是如何讨论政变问题的详细情节。为什么文件将这个重要情节“省略”了？！既然与会的人，除陈励耘以外，还有三个重要人证，文件就应该引用参与“三国四方会议”的其他人，关于会议内容的相关证词。为什么文件也将这些重要情节“省略”了？！

不言而喻，中央文件对陈励耘的以上两点指控，是非常要害的！它关系到“571工程纪要”有没有一个“活证人”的问题，关系到陈本人是否知道“两谋”的问题，关系到“三国四方”会议的性质问题，关系到参与“三国四方”会议的其他人，是否知道“两谋”的问题。

但是，后来的“公开审判”，却令人匪夷所思地“蹊跷”地“绕过”了这两个实质问题，不去对这两个问题的情节，进行细究。这只能说明，事实上，文件对陈励耘的上述指控，查无实据！其他与会的人，没有一个作出与陈励耘相同的“交代”。

这就说明，当初文件上“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说法，完全是逼、供、信的产物！以上中央文件对陈励耘的两点指控，纯属不实之词！陈励耘不知道“571工程纪要”；“三国四方会议”上，也没有讨论“政变问题”！

既然，陈励耘不知道“571工程纪要”，既然“三国四方会议”没有讨论“政变问题”，那么，陈励耘何罪之有呢？！

事实是，犯罪情节可以不查，可以巧妙地“绕过”，事实可以没有，但“罪”是一定要判的。这就是官方所谓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其实是：“法律必须以政治需要为依据”！

◇ 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与政变无关

关于林彪事件中著名的“三国四方”会议，官方在1971年的中央57号文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中，把它作为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阶段的重要证据之一，有过浓墨重彩的渲染。但是，仔细研究，令人疑窦丛生。

(1) 我们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三国四方会议”，是1971年3月31日晚开始的。



林立果企图实施反革命政变的时间是1971年9月8日。也就是说，两者相隔，整整半年之久。

必须指出这样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政变，最怕的就是“走漏风声”。因此，为了严守机密，只有在发动政变的前夕，才能向参加者公布。否则，必遭杀身之祸！

作为久经沙场，且亲身参加过堪称“政变”经典之作的“南昌起义”的林彪，怎么会愚蠢到不顾兵家之大忌，叫他的儿子林立果，在距9.13政变半年之前，在远离政变中心——北京钓鱼台数千里的上海，把几个矛盾重重的人，搞在一起，大谈什么反革命政变，还拼凑什么政变的“指挥班子”？！难道他就不懂“夜长梦多”，“日久生变”的道理吗？！实在有悖常理！此其疑点之一。

（2）“材料之二”认定：“三国四方”会议是“按照《‘571工程’纪要》的计划，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在上海召开的”。这个“认定”的证据是什么呢？

与会的直接当事人：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没有一个人知道“571工程纪要”。至今，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作出过“三国四方”会议是“按照《‘571工程’纪要》的计划召开的”的证词。李伟信，作为“纪要”的“半个孤证”，也没有作出过这样的供述。在程洪珍的日记本中，也没有这种记载。因此，“材料之二”的“认定”，只是“推理”和“假设”，没有事实根据！此其疑点之二。

（3）“材料之二”指出，林立果按照林彪“先搞个计划”的“授意”，在1971年3月22日至24日写出了“571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也就是说，这个“纪要”的草案，是在“三国四方”会议前一个星期，才写好。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林彪当时已经首肯了这个“纪要”的草案。试问，在没有林彪首肯的情况下，林立果怎么就能按照《‘571工程’纪要》的草案，擅自在上海召开“三国四方”会议，组织实施，甚至作出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确定了政变的“指挥班子”？！此其疑点之三。

（4）关于开会的准确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必须指出的是，专案和审查搞了十几年，所谓“三国四方”会议，究竟有哪些人参加？他们都是何时到场的？这些重要情节，至今没有说清楚。

1971年的中央57号文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中，虽然多次提到会议的时间问题，但都是采用“1971年3月底”，这样一种笼统的“口径”，回避点明会议的准确起、止时间。直到1982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给陈励耘、周建平的“免于起诉书”和军事法院给王维国、江腾蛟的“判决书”中，仍采用的是“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晚至四月一日晨”，这样一些时间概念相当模糊、宽泛的措词，使人感到其中有那么多“猫腻”！在图们和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中，对会议的准确结束时间，也没有点明。此其疑点之四。

作为办案常识，搞清案件的确切时间，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最起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确定有哪些涉案嫌疑人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作案时间”，就可以马上排除他的作案嫌疑。

中央文件以及后来的“免于起诉书”、“判决书”，在这个时间问题上，多次采用“1971年3月底”和3月31日“晚”、4月1日“晨”之类的含糊措辞，显然不是“一时疏忽”，而是

刻意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周建平算不算“与会者”。

（5）“571工程纪要”明确写着：“指挥班子：江、王、陈”（江是原南空政委江腾蛟，王是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陈是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但是，不在“指挥班子”中的原南空副司令员周建平，竟也被“中央文件”，圈定为“指挥班子”成员。根据墨迹未干的“571工程纪要”，周建平既不是“指挥班子”成员，也不在大、小舰队的“骨干”名单之列，甚至还被排除在“571工程纪要”规定的“保密范围”之外，林立果怎么会在未经林彪首肯的情况下，如此轻率地私自扩大“指挥班子”的范围？究竟哪些人是“指挥班子”成员？此其疑点之五。

（6）法庭上，公诉人沈加良说：“这个会议的召开不是偶然的，是有政治目的的——这个会议是为落实《571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与会的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都不知道“571工程纪要”。那么，有什么证据说明，“会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一王，浙江一陈，南京一周，江腾蛟协调拉总”，就与“571工程纪要”中的“指挥班子：江、王、陈”，是一回事呢？此其疑点之六。

会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一王，浙江一陈，南京一周，江腾蛟协调拉总”的最早的出处，是1971年的中央57号文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二”P5中，原空军党办秘书程洪珍日记本中的一句话。应该指出的是，程洪珍当时根本不在现场。他既不是会议的参加者，也不是场外的工作人员。采信这样一个人的话，本身就不可取。但是，即使笔记本的作者程洪珍，30多年来，也从来没有作出过“三点的头”，就是“571工程纪要”中的“指挥班子”的证言。相反，他的日记本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没授予指挥权”！

公诉人沈加良，把“没授予指挥权”的“三点的头”，认定为“指挥班子”，他不感到荒唐吗？！这难道是“证据确凿”吗？！

由于江、王、陈、周，都不知道“571工程纪要”中有“指挥班子江、王、陈”的说法，当然不会作出“‘三点的头’就是政变‘指挥班子’”的供诉。

这样，公诉人沈加良关于“会议是为落实《571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指控，那种把“三点的头”说成和“指挥班子”是一回事的结论，就成了缺乏事实证据的“推断”。

（7）最重要有意义的是，要搞清楚：“三国四方”会议上，他们究竟谈了哪些有关“两谋”的实质性内容？这是疑点之七。

“材料之二”，P3中，有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据陈励耘交待：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人们不禁要问，与会的人，活着的有四位。为什么只有陈励耘一个人，作出这样的“交代”呢？而且怎么看不到陈对这个敏感问题的详细供述呢？

打倒“四人帮”后，在法庭审判的过程中，再也没有提到陈励耘交待的这一关键问题的细节。陈励耘出狱后，推翻了“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交待”。军检察院在给陈的“免诉书”的犯罪事实部分，对于“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重要情节，只字不提。仅作出“情节较轻”，“免于起诉”的决定。

江腾蛟、王维国、周建平在以后的一切场合中，对于“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情节，都

予以了明白无误的否认。

有充分证据证明，“据陈励耘交待：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不过是陈励耘在当年逼、供、信的环境下，所做的伪证。

（8）至于“三国四方”会议名称的由来，是疑点之八。

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名称，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连听都没听到过”。程洪珍的日记本上，也没有出现过“三国四方会议”的说法。据场外的工作人员说，“那不过是林立果吹牛时的一句“戏言”。所以，后来为了避免“哗众取宠”之嫌，法院和检察院在正式法律文本中，再也不沿用文革时期杜撰出来的“三国四方”会议的说法了，而是改用“秘密会议”。

以上所列八条，只是关于“三国四方会议”众多疑点中的冰山一角。如果把这些疑点背后的真实情况，细细展开，就足以推翻官方关于“会议是为落实《571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臆断。

◇ 陈励耘为什么要作伪证？！

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的“材料之二”页3中说：“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就是说，“三国四方会议”讨论过政变问题的重要人证，是陈励耘。与会的人，除陈励耘之外，还有江腾蛟、王维国、周建平。为什么中央文件上只有陈励耘的交代，而没有其他三人的交代呢？

原来，王维国在十几年的审查过程和法庭审判中，从没有承认“那是个会”，“只不过是几个人坐下来，扯扯”，“如果扯扯就算是会，文革中太多了”。“就是大家坐下来，解决一下团结问题”。

江腾蛟在1980年11月25日下午3点的庭审中说：“开始，陈励耘吃完饭后，林立果讲了几句话，他说你们先谈谈情况吧，要他两个和我先谈情况，他说他有点事情出去一下，办完了再来。”江腾蛟好像十分吃力地回忆道。江腾蛟不知是有意把内容简单化，还是确实忘记了。（见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页453）

江腾蛟说到1971年到上海的问题时，据理力争说到上海确实是为了治病，不是去搞阴谋的。“三国四方会议”之前，林立果先找他谈，并说到上海找陈励耘、王维国谈谈，没想到搞阴谋等等。（见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页383）

周建平说，谈的都是解决团结问题的事。

也就是说，除了陈励耘以外，江、王、周都没有说“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陈励耘的“交代”，只是一个孤证。

陈励耘在专案期间，确实讲了一些“查无实据”的话。在1980年11月25日的庭审中，法庭播放了陈励耘的一段录音：“林说，庐山会议都是几个老总，指黄、吴、李、邱搞坏的，丘八斗不过秀才，现在军队的日子难过啊。接着，他阴险地说，没有暴露的不能再暴露了。林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海有王政委，杭州有陈政委，我们很放心。最后，他对江说，王政委他是上海的指挥官，陈政委是杭州的指挥官，周付司令

是南京的指挥官，还有你们的老政委，他负总责。”

对于陈励耘的这些交代，图们等专案人员，当时也“将信将疑”。其中有一部分，陈很快就“翻供”了。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P224中，对此有一段描述：“陈励耘在‘913’之后，不知是为了表示自己同林彪一伙划清界限而争取立功，还是有意把案情弄复杂，或是其它原因，他交代过一段情况：‘自上海黑会后，我为给林彪政变做准备，积极建立机场武装营、扩建警卫部队，改装了伊尔—10飞机等。’三月间，他向工作人员写材料说明这段是自己编造的内容。那些事都是根据上级战备命令，在上海黑会之前都搞了，与上海黑会无关系。”

根据上述事实，人们完全可以认为，陈励耘在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问题上，作了伪证！

事实也正是如此。陈励耘出狱后，笔者曾有幸走访过他，问及了会议内容。他说：“那就是个解决几个人团结的谈话”。笔者问他，文件中有一句“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说：“我在里面关了那么久，没完没了。不这么说，那还有个头？！”

1988年11月15日，陈励耘出狱后，记者许寅，采访过陈励耘（见许寅：“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载本刊zk0212d——编者），谈及了“会议内容”。归纳起来三条。（1）陈励耘谈了在杭州为林彪盖了一套房子的事。（2）空五军反空降战备工作的成绩（3）由九届二中全会，谈到反对和防范江青、张春桥抢班夺权的事。陈说，不过是扯扯，“根本没有人说开会的事”。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陈励耘真的讨论了“政变”问题，军检院给他的“免于起诉书”里，在犯罪事实方面，就不会对此，只字不提。军检院也不会对他作出“罪行较轻”，“免于起诉”的决定。

事情已经很清楚，中央文件那句“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话，是陈励耘在不能“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的环境下，逼、供、信的产物。因此，得不到与会其他当事人的证词的支持。出狱之后，陈本人对此也翻了供。

被逼无奈，不得不作伪证，就是陈励耘当时的实际情况。在此，我们想告诉所有在专案学习班被逼作过伪证的人们：在涉案人员不能“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的环境下，进行搜集证据的活动，都是非法的活动！这样搜集的所有证据，都是无效的证据！人们完全有理由推翻过去的“供诉”，还事实的真实面目！

纵观林案，在好几个关键问题上，都是采用了“孤证”和“口供”，作为证据。比如“571工程纪要”，只有李伟信“半个孤证”；林彪叛国投敌，靠的就是李文普的一句“孤证”。“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是靠了陈励耘一个人的“口供”，一个“孤证”。这样办案，是违反“轻口供，重证据”的取证原则的。结果，人家一翻供，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 林彪事件中，几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小人物”

众所周知，在林彪事件中，受打击最大的，是毛泽东本人。林彪事件，不仅宣告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破产，而且彻底摧毁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神”的崇高地位。为了挽回“大厦将倾”的厄运，“四人帮”，在当时的“中央文件”中，凭空捏造了“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又在文件中，拼命鼓吹毛泽东在9.13前，如何“神机妙算”地躲开了

林立果的“追杀”，顺利“瓦解”了林彪的“武装政变”。

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军事上的“神机妙算”，都来自于“知己知彼”，来自于准确的情报。舍此，毛泽东要成功地躲开“追杀”，是不可能的。

于是，人们要问，毛泽东的“准确情报”，来自何方？！毛在林彪、林立果身边，有没有“卧底”？从“文件”中，关于当时毛泽东与林立果之间“环环相扣”的，几乎是“捉迷藏”似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情节看，没有“卧底”，是很难想象的！事实上，在“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年代，毛泽东要在林彪、林立果身边，“物色”几个“卧底”，是轻而易举的！

那么，谁是毛泽东的“卧底”呢？我们的视线，很自然地就落在了那几个在林彪事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小人物”身上。他们就是：（1）上了直升飞机，却在关键时刻，“死里逃生”的李伟信，（2）赶到了山海关飞机场，却“鬼使神差”地没有和刘沛丰一起上256飞机的程洪珍，（3）从林彪逃往机场的座驾上，“突然”跳下车，并自伤一枪，从而“捡回一命”的李文普。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他们都是林彪和林立果身边“重要”的“小人物”。请注意：“卧底”的最佳人选，就是这种“小人物”。因为只有“重要”，搜集的情报，才有价值。只有“小人物”，才具备“卧底”人物的隐蔽性。

李伟信，从职务上说，不过只是空四军的一位由普通干事，刚刚提拔上来不久的文化处副处长。开始时，主要负责为林立果收集“毛泽东像章”。但是后来，他负责着照顾林立果的日常生活。与林立果几乎是“形影不离”。程洪珍是空军党办，也是由秘书，刚刚提上来的副主任，职务也不高。但却负责着林立果的文件收发工作，相当于林立果的“机要秘书”。李文普是林彪的贴身保卫参谋，一年365天，不离林彪左右。这三个人，实在都是“卧底”的“最佳人选”！

其次，这三个人，确实在林彪疑案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李伟信是那个至今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的“571工程纪要”的“半个人证”。据他说，“林立果搞了571工程纪要”的草案。于是，法庭就认定确有其事！关于李伟信，还有一件特别“蹊跷”的事。就是在林立果烧毁了“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内的全部文件后，李伟信和他的弟弟，竟然“鬼使神差”地来到“秘密据点”，并在里面逗留了一个来小时。必须指出的是，李伟信是在林立果烧毁文件后，唯一去过那个“秘密据点”的人，他意欲何为？！联想起事发几天后，那位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在该据点中，轻而易举地从桌子上，拿到那本历经“火光之灾”，仍保存完好的记录有“571工程纪要”的笔记本的事，不由使人“匪夷所思”。人们把它和李伟信的“偶然光顾”“秘密据点”的事情，联系起来考虑，是不足为奇的！程洪珍有一本笔记本，据“文件”披露，也是在“秘密据点”里缴获的。该笔记本，记录了闻名遐迩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也成了“重要旁证”。程洪珍没有参加“三国四方”会议。法庭置四位“直接当事人”的证言于不顾，却采信他的笔记内容。可见，他在法官心中的地位。李文普是“林彪出逃目的地是苏联”的唯一“孤证”。正是他，提供了“林彪问：到伊尔库斯科，需多少时间”的重要情节。法庭“违反常理”地采信了他提供的“孤证”。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看到，林彪疑案的关键情节：“571工程纪要”，“三国四方”会议和“林彪出逃目的地是苏联”，竟然都是由这三位“小人物”提供的“孤证”，来支撑的。法庭为什么对这三位“小人物”的话，如此“坚信不疑”呢？为什么对那么多与他们的“孤证”意见

相悖的“反证”，置若罔闻呢？！人们不能不对这三位“小人物”，在林彪事件中的“地位”，在官方思维判断中的“位置”，提出质疑！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这三位“小人物”，都是在最危险的时刻，“传奇般地”摆脱了险境，“安然无恙地”逃生了！你看，李文普跳下林彪座驾时的惊险情节，再看李伟信和周宇驰、于新野，举枪自杀时的“千钧一发”，再看程洪珍巧妙地摆脱了“刘沛丰已上飞机，自己怎么办？”的困境，这简直就像007中的詹姆斯邦德，戏剧般的“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常识告诉我们，在最关键的时刻，巧妙地脱离险境，是每一位“卧底”者，必备的“最高职业境界”！实在令人叹服！

有了这三位“小人物”的情报，毛泽东能不“料事如神”吗？！

事实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这三位“小人物”，不简单！

#### ◇ 从陈伯达的申诉档案，解读“文革”中的林彪

毋庸讳言，林彪是老干部中的重要一位，和全国的老干部，无论是在感情上，思想上，还是在共同的战斗历程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文革之初，在全国绝大多数老干部，对“文革”，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顶牛”顶的很厉害，实际上是，“打心眼里反对”的情况下，林彪却代表军队，大力支持“文革”，支持“造反派”。因此，也就得罪了不少人。林彪当时的所作所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在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带头向“四人帮”发难，“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如果说“二月逆流”，还只是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向江青、张春桥一伙，打响的第一枪，那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就是林彪亲自率领几乎全部与会的老帅、老干部、老将军，向“四人帮”发起的一场气壮山河的围剿战。之后，林彪顶住毛泽东的“大力弹压”，“死不投降”，又在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武装兵谏”的历史剧。

事情怎么会这样发展？其内在逻辑，又是如何演义的？当时，有人说，林彪是“手上挥语录，背后下毒手”。当然，用那种落井下石的阴暗心理，是无法实事求是地解读林彪的真实心路历程的。不过有一点，该话说得倒也不错，林彪挥动“语录”时，就给人一种漫不经心的感觉。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见证人，陈伯达的题为《我向党和特别法庭的交代》的申诉档案，使我们茅斯顿开，如梦初醒。

陈伯达写道：“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前夕，林彪问我：是不是看到一股政治急风暴雨的到临？主席要从北京市委突破。这场斗争可能要二、三年。主席立下了决战状。我问：可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议？林彪说：这是皇旨密令。”

陈伯达还说：“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在林彪家，总理也在。林彪问总理：‘这场政治风暴要烧到哪一级？’总理说：‘局势还不明朗。彭、罗、陆、杨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林彪讲了他对主席的理解，说：‘一场斗争是对准刘、邓，还要烧一下总理。’”

这就是说，1965年，毛泽东已经以“皇旨密令”的方式，向林彪下达了对刘少奇、彭真等人的“绝杀密诏”。

可以想见，在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觉悟的条件下，任何人，不管你是彭真、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叶剑英、贺龙、陈毅，聂荣臻，许世友，谁拿到毛泽东这样的“密诏”，都会坚决地“打倒”毛泽东要你打倒的“任何敌人”，都会“很好地”理解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都会拼命地鼓吹“文革”，都会坚决地支持“造反派”。因此，以这条线索，去解读文革初期的林彪，就很好理解了。

手持“密诏”的林彪，肯定得到了毛的庇护，军队是不能“乱”的。因此，军队干部在文革初期，显得特别“风光”。出于“自保”，军队也难免要抛出一些“虾兵蟹将”。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但是，后来的情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林彪亲自签发了军委8条，主张军队在文革中“不介入”，要“一碗水端平”，但是，毛泽东却针锋相对地指出“不介入，是假的”，“解放军要坚定地支持‘左派’群众。”于是，军队开始动乱了。

陈伯达还说：“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著，有时用铅笔记著。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定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作为一位老干部的“保守”的思维方式。尽管文革初期，林彪曾在毛泽东那里，亲受“密诏”，但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他与毛泽东的决裂。

至于后来，毛泽东如何在九届二中全会前，设下“陷阱”，对林彪“欲擒故纵”；如何逼林彪作检讨；如何“穷追不舍”，即使林彪欲“负荆请罪”，也“拒之门外”，不予理会的情节，很多人，都详细论述过了。在此，恕不累述。

有了陈伯达上述的重要铺垫，林彪在文革中，原来看似不连续的心路历程，就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连续的过程了。

一言以蔽之，都是毛泽东使的坏！

#### ◇ 解决林彪事件的政治时机

重大政治问题的解决，有个时机问题。这是人们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得出的政治经验。在研究林彪疑案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不少直接当事人，至今还心有余悸。他们说：“冤情很大，时机未到”。

现今中国，有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其中，包括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对“文革”的历史结案问题；对林彪、高岗疑案的清理问题；对赵紫阳、“六四”事件的平反问题；对“法轮功”群体事件的平反问题……。等等，等等。

时至今日，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和林彪、高岗疑案的清理问题，与后面几个问题相比，

情况是不一样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对后者，官方是绝对“封杀”的，而对前两个问题，半官方的电视媒体，甚至“解放日报”，都可以讨论，可以质疑。因为，它们已从政治范畴，走向历史范畴。但不可避免的是，随着讨论的深入，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被披露，许多重要的疑点，被澄清，许多历史的真相，得以重见天日。世人对毛泽东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对林彪事件的真相，有了“茅塞顿开”的了解。芸芸众生就会从“个人崇拜”的泥潭中挣脱出来，就会从“中央文件”的迷雾中，解放出来。这样，为日后解决这些问题，客观上，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水到则渠成矣。

事实上，这些问题既是当权者的“政治包袱”，又是他们的“政治财富”。如果他们具备政治大智慧，历史新思维，治国大手笔，安邦大魄力，就能化腐朽为神奇，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迎来清平政治，朗朗乾坤的大好局面。否则，这些“历史包袱”和新的“政治欠帐”，就会越背越多，越背越重，直到不堪重负的一天，大厦轰然倒塌。那时，这些历史政治问题，都会伴随着新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共和”革命，在“凤凰涅槃”中，重生。

这是对当权者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被推上权力舞台的他们，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

#### ◇ 林彪事件与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的关系

在现今中国的政治历史遗留问题中，影响面最广，涉及人员最多，震撼力最强，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三个，按时间顺序：（1）林彪事件。（2）赵紫阳、“六四”事件。（3）“法轮功”群体事件。

这些问题之所以重大，之所以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原因就在于，对这些问题真相的披露和重新认识，直接关系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人的政治历史责任！

在此，我们仅就林彪事件与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的关系问题，提一些看法。

一个人活在世上，几十年，总是有对，也有错！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也有对，也有错。我们要崇拜，只能崇拜他的对的地方，伟大的地方，总不能让人民去崇拜他的错误和罪行吧！否则，就不是“崇拜”，而是“迷信”了。就象法西斯党徒，对希特勒的迷信一样！不仅行动上要“保持一致”，而且思想上也“保持一致”！

由于毛泽东担任过中共党的主席，领导中国走过一段很长的历史过程，与一般人不同，他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不可避免地也有过错，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令人发指的罪行！

正如陆定一同志所评价的：“毛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

这就像我们读书考试一样。数学考了100分，语文考了50分。那就是数学优秀，语文不及格！不能搞什么“平均75分，全及格”。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也不能搞什么“三七开”。功劳就是功劳，过错就是过错，罪行就是罪行！分得清清楚楚，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

我们这些有过文革阅历的人们，对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文革”，给全国人民、给我们的民族、给我们的国家所带来的巨大灾难，是感同身受的！是深恶痛绝的！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如果说文革中，人们对毛的历史功绩已经“大树特树”够了，那么，毛在建国后以及文革中的罪行，还远远没有彻底清算！如果说毛泽东的历史罪行是“罄竹难书”，也绝不为过!!!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领导人，在“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开了一个头。

1986年7月，在北戴河会议上，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作了如下阐述：“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政治评价，我们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错误要由我们的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泽东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从部署、策划，到展开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这当然毛要负很大责任。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也包含了对毛的评价。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这里面有多种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

解读邓小平的这段话，有三条：第一，对毛的历史评价，没有完！但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局限，受党内一些同志思想认识的局限，只好“暂不追究”。第二，对当时不能给毛泽东作出彻底的历史评价的错误，邓小平勇敢地承担了历史责任！（令人钦佩！）并把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的保留意见，记录在案。为今后重提对毛的历史评价问题，留下伏笔。第三，确定15～20年后，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时机成熟了！

邓小平对毛的历史评价问题，采取表明态度，勇担责任，留下伏笔，确定时限的做法，体现了马列主义革命大家的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是大智慧，大手笔，一派政治大家的风范！

现在，19年过去了。邓小平对毛的历史评价所规定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作为邓小平“钦定”的“隔代接班人”的胡锦涛，能不能“执行”，“接班”？人们正拭目以待！

毛泽东欠下的历史罪、帐，一定要进一步地清算。时间拖得越久，清算就越彻底！

林彪事件的真相，必将伴随着历史对毛泽东罪行的彻底清算，大白于天下；必将伴随着中国“民主、共和”的革命浪潮，涅槃重生！

当然，不管怎么清算，也只是清算毛的罪行，而不是清算他的功劳，他的智慧！对他的功劳，对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文学天才，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如果清算他的功劳，清算他思想的真理部分，哪怕是过头一步，也会变成“谬误”。对一个人的评价，是个很严肃、很科学、很复杂的问题，来不得半点轻率！也需要大智慧，大手笔！

毛泽东生前也说：“任后人去评说吧”！倒还有点“大家风范”，也许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吧！

~~~~~

【史海钩沉】

1970年庐山会议开幕式

• 佚名 •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开幕了。

开会的那天，总理交代杜修贤和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说：会场拍摄时，你们要注意多拍摄西面的会场。一时杜没有明白总理的意思，只是点头答应了。待开会时，当他把镜头举向会场的西面才恍然大悟，会场的西面坐着老师们和中央的老委员们。到会议结束，他更是大彻大悟，会场西面大多是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委员。

杜修贤真惊讶总理料事如神的精明和把握心态的准确！

在当天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按预先宣布的程序，首先应是康生作宪法修改草案报告。然而，林彪突然提出要讲几点意见。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继续坚持称天才，坚持设国家主席。这种场合下，林彪是以党的副主席身份讲话，传达的却是个人意见。他要把个人观点假以集体决议传达给与会的中央委员。

他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这次宪法草案“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整个宪法草案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是这次宪法的一个特点。这种领袖地位是“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翻来复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讲话时，讲台上放着一个稿子。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大家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完后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一不悦的情绪。

周总理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主席宣布散会。

林彪的讲话明白地把“国家元首”这个毛泽东坚决推卸的头衔加予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与会人员没有感到异常，认为这是中央的安排。

当天晚上，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议上，吴法宪提议要全会第二天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的讲话。政治局委员多数同意，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遵从众意，通过了这样的安排。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陈伯达、叶群已预有准备。上庐山后，他们临时组织了一些语录，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团伙中的人。

8月24日，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按事先商定的口径，引用同样的语录分别在华北组、西南组、中南组、西北组发言，共同点是坚持“天才论”，提议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许多人不明真相，但出于对中央的信任和毛泽东的崇拜，纷纷赞同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陈伯达等人的发言同时影射张春桥一伙诋毁毛泽东。

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中说：“竟然有个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陈伯达的这些发言印成华北组2号简报（大会第6号简报）发给与会者。

简报中还写道：大家听了陈伯达等的发言，知道了党内竟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陈伯达的发言投合了林彪的口味。林彪听秘书读过这份简报后，高兴得笑了，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份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华北组的简报一出，整个会议声调大变，一些委员表现得情绪激动，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各组都谈到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

会议没有按毛泽东预先的希望开成一个团结的会。陈伯达充当先锋，挑起争论，矛头直指江青、张春桥等人。两个集团的斗争趋于公开化。

“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江青气急败坏，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绘声绘色地反映大会的情况。会上出现这种背着毛泽东的明显是有统一布置的“揪人”行动，使毛泽东感到事态已十分严重。这次的对手是远远超过彭德怀了。如果说59年庐山会议的“军事俱乐部”是纯系乌有，那么，林彪军人集团却是虎视眈眈，随时可以起事的威慑力量。毛泽东不能不提防把政变经背得烂熟的林彪。

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开始部署反击了。

毛、林、周、陈、康“五巨头”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笑容从毛泽东脸上消失，预示着会议的气氛是沉重的。“文化革命”把毛泽东推拥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指示具有无上的权威。

毛泽东严肃地作出三项指示：

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

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毛泽东的目光射向陈伯达，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

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大约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他的话音里除了威严还透出一种凄楚。这种话是他从未说过的。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那种高屋建瓴，那种嘻笑怒骂的潇洒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降。林彪和陈伯达都意识到，这回他们输了。此后，他们便从政治巅峰上跌落下来，一步步走了下坡路。

叶群、吴法宪等人匆忙撤回、销毁自己的言论。开始，留守北京没有来庐山参加前期开会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也照叶群的部署准备了一份类似的发言稿，听说山上风云突变，就悄悄地销毁了文稿。

8月26、27日，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作检讨。吴法宪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则极力安抚左右为难的吴法宪：“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扯到林彪、黄永胜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随后，叶群、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布置统一口径，强调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能牵涉林彪，黄、吴、李、邱只讲自己，互不涉及。

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毛泽东决定从陈伯达开刀。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要求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并把林彪一伙的这次表演形容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后来杜修贤回忆道：“开幕时，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到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时，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我记得闭幕那天，气氛空前的紧张。前几天许多中央委员还误中林彪‘天才论’的圈套，会场里响起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合唱声。可这时，全场鸦雀无声，针落闻声。

“我们记者站在后台，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主席台那四位常委脸上的表情让人脊梁上哧哧地蹿凉气。毛泽东气愤里带着悲楚；林彪拉着沮丧透顶的瘦脸；周恩来紧抿嘴唇异常严肃；康生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着捉摸不定的光。我们只敢探头朝台上望，脚下就是不敢迈步！”

原来，九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并展开批判。

就这样，陈伯达当了林彪的替罪羊，林彪仍然高坐主席台之上，可是，他这时的心情已经不比初上庐山信心满怀了，在毛泽东心中，他已经“失宠”了。

庐山，对于林彪来说，太熟悉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历史选择了庐山这个神秘的政治舞台，让林彪上演了极其精彩的大戏。让我们再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1958年夏天那次庐山会议，看看在那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

□ 节选自《红镜头中的毛泽东》

~~~~~

## 【史实辨析】

### 何以冠名“文化”的“革命”

• 李大苗 •

迄今为止，“文革”作为缩写，越来越脱离历史的踪迹，特别是用“十年浩劫”来凸显暴烈的历史割舍，将“文革”运作成为兀如其来的风暴。对于“文革”，正统的说法是自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左右开始。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文革”之前，针对农村普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四清运动”。这个运动以什么样的形式结束或者以什么结论终结，迄今没有可以清晰的说法令人信服。在“四清”和“文革”之间非常狭窄的时空中，还塞入了一个简称为“社教运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当时官方文件中还有“农村社教运动”这样的狭义特指。浏览到的“社教”研究文章，最远的是将结束的时间桩定在1966年中期，有着革命运动前赴后继的节点含义。

事实是这样的吗？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通常被列入“文革”的视点。也就是说，“文革”应当是不迟于1965年11月就吹响了自己的号角。另一个史证是，早在1964年7月间，就已经成立了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隶属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文革”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关键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早出现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这份文件中，时间是1965年1月。或许我们可以用这些脉络推导说，毛泽东的想法有着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可是，由姚文元名义发难开始的进程，闪亮出来的旗号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无论从力度的标量上还是方向上，都和整治“走资派”大相径庭。

“五人文革小组”出自毛泽东1964年6月27日的对“文艺整风”一段批语：中国的文化界已经“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相观那个时候，江青在上海刻意培育代表无产阶级文化的现代剧已经有一年之久，即使北京以《红灯记》来不留口实地互动对应，全国的整体状态还没有能清楚留意到潜在政治动向。毫无疑问，这个过程应当符合“文化革命”的基本动议。包括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讨伐也还是没有漫过文化堤岸。姚文元文章打开了“文字狱”的闸门，北京方面更权威的人物或许依然可以不以为然地抗拒着，可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任何人都明白革命已经在权力政治领地登陆。

“走资派”这个关键词并未出现在“五一六通知”的文本中，反而关于“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却是指向明确的责难。“通知”的文字非常所向披靡，至今没有人提出这个“通知”有中庸调和的疑点。只是文件的收尾中用敲山震虎的方式说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句话是毛泽东的名言，但一定就是“文革”方向的潜台词吗？被断然重组的“中央文革”，据信于五月二十八日开始作业，

六月一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日后中央的人员排序中，刘少奇已经落魄在第八的位置，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诰词来掩饰中央发生的问题。由此断定，毛泽东已经基本完成了发难过程。有人会以为当年八月的中央全会来作为转折点，可我认为，毛泽东的决心其实早已坚定，中央全会不过是走一个形式，他甚至有着和整个中央委员会决裂的心地。以《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为标志，“革命”的轨迹已经走离了“文化”范畴，在真正的权力恶斗中持续政治规律的必然。

连毛泽东本人都觉得有些“黑话”的那封《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这样说道：“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这个话语和陈伯达的那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如出一辙，证明陈伯达完整借用了毛泽东某次置腹的谈话，同时文词中那个“而且”也证明，“牛鬼蛇神”有着特定的定义，至少“党内当权派”或者“走资派”并不在其中，后者最勉强也不过“右派”而已。毛泽东在信中有这样的话语“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事过境迁的感觉很难再体会出“文革”术语之间的差异，党内问题以“走资派”冠名，最高权力问题早在“五一六通知”中就以“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来特指或者影射了。关于“牛鬼蛇神”，甚至“赫鲁晓夫”们都没有与毛泽东的定义有明显的歧见，只是毛泽东还要追究到“牛鬼蛇神”背后，而“赫鲁晓夫”们觉得到此为止罢了。1966年5月，北京市委坍塌掉了，党内似乎没有人公开同情彭真。经毛泽东认可的李雪峰和吴德组建的新市委，在是否派出“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没有同刘少奇等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有什么争议。6月12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等赴杭州求见毛泽东，征询对是否派出“工作组”的意见。即使是刘少奇等背着毛泽东做出断决，至少也是6月14日以后的事情了。更何况大规模派出“工作组”是6月20日左右才形成北京中央的决定。但是7月8日的那封信，毛泽东已经彻底向江青袒露了内中的心迹，即——“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难道刘少奇读不懂毛泽东做就的“五一六通知”吗？久经党内斗争的刘少奇不明白毛泽东的这下面个说法吗？“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新的“文革小组”的人选何曾有过争议？无论是回避还是排斥，刘少奇明白抗拒毛泽东的想法必然导致党内的分裂，他的信仰、经历和影响力决定他不能够违背“组织原则”，他必须无可奈何地按照毛泽东的布局一步步走下去，哪怕知道那是个万劫不复的陷阱。“工作组”当然是刘少奇派出去的，但是这个决定是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共同做出的，而且也告知毛泽东，毛泽东对此并没有明确提出异议。但是不到二十天之后的7月8日，毛泽东竟然还是在阴森森的语境中向江青做出暗自的表白。

这样的情形，如果再做逻辑推导，毛和刘都明晰看到的事实是，“文化”的进一步“革命”受到体制，也就是“由上而下”官僚机构的反抗。彭真和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各权力机关的下场对各地产生极大的触动，刘少奇在上下左右的迫压下，按照历史运动的惯用前例派出了工作组，而内心恐怕更有对毛泽东的畏惧下的惶恐不安。这个推论的反证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存在着一个以刘少奇为司令部的有组织的暗中抵抗甚至改变权力格局的行止。于是，本来旨在“横扫牛鬼蛇神”并剔除党内代理人的“文化革命”，竟然在“五十多天”里最终转变为全面的政治运动。

《人民日报》在1966年6月间的社论可以展示这个脉络：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和《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6月3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6月4日《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和《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

爱”的遮羞布》，6月5日《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6月16日《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6月20日《革命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以及《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等等。从时间顺序来看，《人民日报》六月中旬之前的社论更表现出关于“学术”和“文化”范畴的号召，而其后的社论就有了鼓励行动的味道。这个特征很重要，据信正是在六月中旬陈伯达从江青那里得知毛泽东反对派出“工作组”的消息。

我们还可以从那个转折性的六月向前追述，1966年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5日，发表关锋、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1966年3月，《红旗》杂志又发表戚本禹等3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些蓄意的文章，着力于学术文化方面的政治化，又何尝不是“文化革命”的本来含义呢？其中“兴无灭资”这样用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将意识形态的势不两立推置到社会意识的前台，社会批判也更多地纠缠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腐朽意识”这样“文化”和“准文化”的细节。但这个时候的政治语气还是“文化革命”，然后前缀上“无产阶级”，再后来有了一个“大”字，让历史的心态定格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上。

我以为，“革命”之所以用“文化”来表述，基本有了比较真切的轮廓。这样的说法并非否定中央权力的纷争，而是步步迫压地终于走上本来没有预算的政治支出。包括毛泽东本人都并非相信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顽强地和他作对，而是对体制不能与他同和地建造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状态宣泄极度不满。对于刘少奇和其它最高权力层面人物，毛泽东并不以为他们是值得大动干戈的对手，很早开始他就立意在社会精神的整肃。一些人认为“文革”的暴虐或者所谓“民主”行动有着某些自发性、自主性，其看法毫无疑问忽略掉了不晚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开始了的政治鼓动和人文精神的引导。所谓“四大”，首先隐藏了另一个“大”，也就是“大学习”。所有至今还赞美“文革”为“自发民主”的经历者，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从姚文元、戚本禹那里得到启发的？而“从灵魂爆发”的革命又收附在什么价值中感受呢？

至于为什么以“文化”为标签或者说是“突破口”，我想，这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此不论为好。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